

西汉张骞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赵天宝

(西南政法大学 应用法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 发现西汉王朝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拓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为西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张骞的西域之行及其远见卓识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及西南民族的大融合, 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创建了不朽功勋。

关键词: 张骞; 中华民族; 西域; 西南夷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9)01-0120-05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至 21 世纪,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实体, 但并不是这 56 个民族的简单叠加, 因为国内的 56 个民族在百余年的反抗侵略与抵抗压迫中已经形成一个“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 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 即都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中华民族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全体人民, 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 中华民族是一体, 它们虽则都称‘民族’, 但层次不同。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 56 个民族是基层, 中华民族是高层”^[1]。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进程中, 西汉王朝作用甚巨, 张骞尤其功不可没! 此前对张骞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其外交能力、爱国气节、政治影响等方面居多, 研究著作主要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江应樑等的《中国民族史》^[2]和田继周的《秦汉民族史》^[3]等, 在中国期刊网上有一百多篇论文, 如《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4]、《张骞其人》、《张骞所访大夏考》、《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自然生态

环境保护》、《西域使臣张骞》^[5]、《月氏西迁与张骞西使新论》、《张骞西使研究概述》^[6]、《张骞凿空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述论》^[7]、《张骞政治外交与佛教关系刍论》、《论司马迁笔下的张骞》^[8]等, 但这些著作和论文对张骞促进了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尚不够全面, 本文欲弥补这一缺憾。

一、张骞及其所处历史背景

张骞(约公元前 175 年—前 114 年), “汉中人也”^[9], 公元前 156 年, 如伍于李广麾下, 因作战骁勇, 被李广调任左侍。汉武帝建元年间张骞位列朝廷郎官, 公元前 138 年向汉武帝毛遂自荐首次出使西域。正所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张骞一行刚出陇西, 即为匈奴所俘, 军臣单于赐其妻室, 意图收降张骞, 但张骞对大汉忠心耿耿, 始终“持汉节不失”^[9]。一晃十年已去, 张骞于公元前 128 年抓住机会逃出匈奴, 穿越千里沙漠戈壁, 继续完成汉武帝赋予的使命。张骞此次出行并未实现汉武帝预定的战略目标, 即联合大月氏攻击匈奴, 故不得不于公元前 127 年东归长安, 归途中再次落入匈奴人手中。

收稿日期: 2008-11-24

作者简介: 赵天宝(1972-), 男, 河南焦作人, 讲师, 法学博士研究生。

公元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内乱之际,终于得以逃离匈奴,辗转返回长安。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汇报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及其所见所闻,扩展了汉武帝的视野,为汉武帝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因而被拜为太中大夫。公元前123年,张骞凭借其荒漠行走经验,尤能“知水草处,使军得以不乏”^[9],以校尉身份跟随卫青反击匈奴而大获全胜,受封博望侯。公元前122年,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开通“蜀身毒道”,故其被派往蜀地探寻此路。尽管张骞此行为达到开通西南夷之目的,但为日后平定西南夷打下了基础。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获得抗击匈奴的彻底胜利,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张骞这一次出使比较顺利,于公元前115年返回长安。这次西域之行,张骞出色地完成汉庭使命,即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此外,张骞还派多名副使访问了西域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于阗等国,为以后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奠定了基础。

张骞出生于文景之治之时,为官于汉武帝期间。届时西汉王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力也日益强大。史学家曾有如下描述:“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9]。“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类矣!”^[9]至汉武帝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漏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10]。正是因为汉朝经济发展致使国力强大,加上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愿继续奉行当年汉高祖与冒顿单于签订的具有屈辱性的和亲政策了,转而寻求攻击匈奴之法。适逢听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循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9]。此时正中汉武帝下怀,由此拉开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序幕。

二、张骞“凿空”西域: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融合

张骞一生两次出使西域,前后历经二十多年,为西汉王朝实行开发西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司马迁所赞:“自张骞开通西域……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

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12]。由此可见,张骞在西域诸国影响之巨。正因如此,汉朝不仅逐步实现了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而且采取多种方法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大融合。

(一)外交互访

张骞两次出使虽为迅速达到“与汉共击匈奴”之战略目的,但加强了西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影响。张骞出使首先加强了汉与乌孙的关系。乌孙国王因为惧怕近敌匈奴,虽然不敢与汉庭联手进攻匈奴,但却遣使臣至汉,“见汉人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12],这就为两国日后成功联手共击匈奴埋下了伏笔。其次,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于阗等国。“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0]。最后,汉武帝亦不断遣使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般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时。……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人,少者五六人,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2]。这些互访活动加深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互相了解,开阔了汉朝的全球视野,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让西域诸国了解了汉朝文化、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可以凭借汉朝的力量对抗东北面的强敌——匈奴,这与汉武帝联合西域诸国围攻匈奴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正是在西汉与西域诸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对抗匈奴的基础上,才不断增加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交往,为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移民置郡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欲劝乌孙国东还故地,以同汉朝联手进攻匈奴。由于乌孙不肯东归,汉武帝乃于浑邪故地先后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且“徙民以实之”^[9]。河西四郡的建置,使西汉边界直接与西域相连接,在军事上联合西域诸国对匈奴形成包围之势,将匈奴的势力范围向北驱逐了一大步,同时为汉朝人民与西域交往提供了方便条件,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接触机会大大增加,中原民族的先进生产力极大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西北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开始学习农耕以维持生存,逐步放弃了原来漂泊不定的游牧方式。客观地说,汉武帝的这项英明决策加快了中原民族与西域民族的融合步伐。

(三)战争征服

河西四郡的建置,尽管加强了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但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反感。究其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由于汉朝商人为谋关市之利, 多求出使西域, 致使西域诸国犯罪数量大增。这是由于中原商人受到利益的驱动,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想通过“走私”货物以图私利, 这样就难免致使当时尚处于落后阶段的西域人上当受骗, 其中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增多。其次, 由于西域诸国的地方官“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6]。一些中原商人通过贿赂西域的地方官, 通过地方官的权力达到自己经商获利的目的, 而置西域百姓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最后, 西域诸国“亦厌汉使人有言轻重, 度汉兵远不能至, 而禁食物以困汉使。汉使乏绝积怨, 互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 当空道, 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骑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10]。县官不如现管, 当这些中原商人不断获利而使当地人贫困甚至破产时, 劫掠这些商人也就成为部分西域人发家致富的捷径。为此, 中原商人向西汉王朝的告急文书也就雪片般地落到汉武帝的案牍上。鉴于此, 汉武帝为了解决汉使与西域诸国的矛盾, 也为了清除长安通往西域的障碍, 于公元前 108 年派将军赵破奴“击姑师, 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 虏楼兰王, 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10]。另有一史例就是西汉征伐大宛国, 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 两次对大宛作战, 首次失败而最终获胜。因大宛属西域强国, 而西汉攻克大宛, 起到了“擒贼先擒王”的震慑效应, 为西汉统治西域奠定了坚实基础。“诸所过小国闻宛破, 皆使其子弟从入贡赋, 见天子, 因为质焉”^[9]。“自大宛破后, 西域震惧, 汉使西域者亦得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以西诸国, 求奇物, 因风览伐宛之威德。于是, 自敦煌西至盐泽, 往往起亭, 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 置使者校尉领护, 以给使外国者”^[11]。这是西汉在西域直接行使行政区域建置的开端。至此, 中原民族与西域民族的融合步伐开始加速发展。

(四) 通婚和亲

历代封建王朝, 当一方处于战略上的弱势时, 无不采用先献贡、后和亲之策, 因献贡表示臣服于对方; 和亲娶了对方公主, 就成了对方的姑爷, 无疑要对老岳父礼让有加。乌孙国求和亲就是一个例证。汉武帝派大将赵破奴攻克楼兰、姑师后, 乌孙恐, 求和亲。公元前 105 年, 汉以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 妻乌孙昆末。后又转房于岑陁, 不久细君公主忧郁而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公主妻岑陁, 岑陁死, 又转房于肥王; 肥王死, 则转房于泥靡。此外, 边境的汉人及商人与西域诸国人通婚者更是不计其

数。汉朝与乌孙国和亲政策的推行, 不仅实现了联合乌孙等国“断匈奴右臂”的目的, 也使中原民族的先进文化大踏步走入西域荒野, 人员的来往和文化的交流无疑大大促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北民族的大融合。

三、张骞志通“蜀身度道”: 促进中原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说: “臣在大夏时, 见邛竹杖、蜀布, 问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今印度)。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其俗土著, 与大夏同, 而卑湿暑热, 其民乘象以战, 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 大夏去汉万二千里, 居西南, 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 有蜀物, 此其去蜀不远矣”^[10]。汉武帝深以为然, 于是在公元前 122 年, “令骞因蜀、犍为, 发间使似道并出, 出犍、出冉、出徙、出邛樊。毕各行医, 二千里, 其北方闭氏、笮, 南方闭嵩、昆明”^[10]。这说明当时从四川到印度肯定有通道可入, 从而使一心想扩大汉朝疆域和影响的汉武帝同意张骞的建议, 开发大西南, 与其加强联系, 并最终在后来的历史长河里把西南地区写入了中华民族的长幅画卷。张骞此次探索打通“蜀身度道”, 虽然未达到既定目的, 但也了解了西南夷诸国的状况。其后, 西汉王朝在平定南越的反叛之后, 汉武帝主要通过战争手段促进中原民族与西南民族的融合。

公元前 111 年, 西汉王朝平定南越之后, 继续进军大西南, 取南夷, 遂以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 见汉灭南越, 遂入朝, 汉武帝仍以其为夜郎王。之后, 汉兵又诛且兰、邛君, 并杀笮侯, 冉駹等皆震恐, 请臣置吏。汉以邛都为越嵩郡, 笮都为沈黎郡, 冉駹为汶山郡, 广西白马为武都郡。公元前 109 年, 汉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击劳深、靡莫, 以兵临滇。滇举国降, 请置吏入朝。于是, 以为益州郡, 赐给滇王王印, 使复长其民。至此, 西汉王朝基本平定了西南夷, 并置牂柯、越嵩、沈黎、汶山、益州诸郡以统之, 使得中原民族与西南民族的交往日渐增多, 为民族融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公元前 105 年, “汉即通西南夷, 开五郡, 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岁遣十余辈出此初郡, 皆闭昆明, 为所杀, 夺币物。于是天子赦京师之命令从军, 遣拔胡将军郭昌以击之, 斩首数十万。后复遣使, 终不得通”^[11]。尽管西汉

王朝此次征伐并未实现其战略目的,即打通“蜀身毒道”,但使得汉族的铁器与农耕技术传入了西南夷地区,极大地提高了西南民族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能力,使相当一部分西南民族改变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为固定农耕的作业方式,同时中原民族的文化习俗也随之传入西南地区,这些都大大推进了中原民族与西南民族的融合。

四、张骞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贡献

陈连开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具体地说,各民族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统一国家中共处并发展的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地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西汉王朝的推动作用决不可以低估。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及其开发西南夷的远见卓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张骞两度出使西域,置自身生死于不顾,他的功绩在于不仅开阔了古代中国人的视野,丰富了汉代人的地理知识,而且使当时最高统治者汉武帝认识到世界之大,从而激发了其征服西域和西南夷的雄心壮志。西汉政府西域的客观后果是打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对沟通和强化中原与广大西域地区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西域龟兹曾经常有人往还长安,其使者或朝贺、或经商,无论官方或民间,他们都把汉家制度移植过去,为其所用。龟兹“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官室,作微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2]就是一个西域民族学习汉文化的一个证明。丝绸之路还沟通了中国与西亚诸国及印度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初步形成“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之风,同时扩大了中原民族与西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为“以夏变夷”打下了基础。通过通婚互市,加快了中华民族“多元”的融合。西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开发和治理,写下了西域开发史上辉煌的一页,为中国的一统、民族的团结和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桥梁,在中国封建经济形态下,封闭的自然经

济占支配地位。然而自先秦以来,西北就有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地进行联系的渠道。张骞出使西域后,这条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更加活跃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和中原内地及西方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打开了一个窗口。在它的影响下,西域的服务业与整个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在东部只有地方性和国内市场时,西北已经与国外市场增进了联系。因而,其市场和需求都比东部多了一个层次,这成为早期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优势,客观上有益于刺激当时西域和西汉王朝经济的发展。此外,在张骞的建议下,汉武帝实施了开通“蜀身毒道”的军事及外交行动。虽然“蜀身毒道”未被开通,但也取得一定成果,设置了西南五郡,为“茶马古道”的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既巩固了汉王朝对西南边陲的统治,也使广大的西南地区从此划入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版图,同时加强了中原民族与西南民族的大融合。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西汉王朝通过对西域和西南夷的开发与经营,实现了中原民族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于此功绩,抚今追昔,博望侯张骞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2] 江应樑, 林超民. 中国民族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0.
- [3] 田继周. 秦汉民族史[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 [4] 赵 雷. 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J]. 船山学刊, 2008(1): 164-166.
- [5] 宗立书. 西域使臣张骞[J]. 中国民族, 2004(3): 18-19.
- [6] 施新荣, 赵 欣. 张骞西使研究概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 24(1): 15-20.
- [7] 洪 涛. 张骞“凿空”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J]. 西域研究, 1998 8(1): 21-27.
- [8] 宋嗣廉. 论司马迁笔下的张骞[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4): 48-51.
- [9] 班 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ZHANG Q ian in W estern H an D ynasty and of f ormation C hinese nation

ZHAO T ian-bao

(School of APPLIED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f 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Western Han Dynast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 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ecause it pioneered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southwest regions. As ZHANG Q ian had bee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on diplomatic missions twice, he provided the reliable basis correct decision-making for Western Han Dynasty. Objectively speaking, ZHANG Q ian's foresight and sagacity precisely promoted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nationality with the northwest nationality and the southwest nationality. He created the immortal feat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ZHANG Q ian; Chinese nation; western region; southwest region

(上接第 119 页)

- | | |
|--|--|
| <p>[3] 陈独秀. 敬告青年开刊词[J]. 青年杂志, 1915 1 (1): 1.</p> <p>[4]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上海: 亚东图书馆, 1922.</p> <p>[5]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p> <p>[6]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 第 1 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p> <p>[7] 工人出版社. 《劳动界》汇编[G].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58.</p> <p>[8] 任建树. 陈独秀传(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p> | <p>[9] 吴 晓. 陈独秀传奇[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p> <p>[10] 朱文华. 终身的反对派: 陈独秀评传[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5.</p> <p>[11] 中共一大纪念馆. “一大”前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p> <p>[12] 任建树. 陈独秀传: 从秀才到总书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p> <p>[13] 唐宝林. 陈独秀传(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p> <p>[14] 贾兴权. 陈独秀传[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p> |
|--|--|

CHEN Du xiu's earlier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FAN 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CHEN Du xiu's earlier thoughts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for it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outlook.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 include advocating new education, west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affection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reforms of art scienc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in Guangdong.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finds that CHEN Du xiu's earlier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educational importance, the socialist educational goals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Key words CHEN Du xiu; educational thought; educational practice; educational reform